



英国教育史学： 创立与变革

武翠红 ◎ 著

British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
Fou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国教育史学： 创立与变革

武翠红 ◎著

British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
Fou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 / 武翠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6100 - 5

I. ①英… II. ①武… III. ①教育史 - 研究 - 英国 IV. ①G556.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93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芮 信
责任校对 闫 萍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54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此书获得“江苏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和江苏大学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资助出版。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 13YJC880081) 系列成果之一。

前　　言

英国传统远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只是处在一种不适应的状态，在不需要彻底废除传统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来适应已经变化的社会环境。

——弗雷德·克拉克

1940年，弗雷德·克拉克（F. Clarke）指出：“英国人必须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要反省潜藏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活动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是推动英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而‘英国传统’远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只是处在一种不适应的状态，在不需要彻底废除传统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来适应已经变化的社会环境。”^①这段话表明克拉克希望英国教育学者能够担负起反思教育研究的重任，而这种反思是对“传统”的一种自然传承，是“传统”历史发展的自然结局，在反思“传统”的过程中传承“传统”，以促进英国教育史学的发展。

一 研究缘由

随着世界各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蓬勃展开，教育史学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共同话题。英国教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特征，是世界教育史学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英国教育史学是如何演变的？它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连接点？这些问题引起国际教育史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对我国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史学的凸显

教育史学“探讨教育史家所进行的教育历史研究，包括这种研究成

^① F. Clarke,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n English Interpretation*, London: The Shedon Pr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0, p. 6.

果的陈述体系”^①，“证明教育史学科自身形成过程中的认识特点和研究方法”^②，以教育史作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教育史学史属于专业性的学术史，是一种学科史，主要任务在于探寻教育史学科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教育史学自身作为反思的对象，是反思的反思，“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就属于这类反思性的研究。这类反思工作有利于规范与促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史学者的共识。近年来，在总结教育史学科改革的经验时，国际教育史学会（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简称ISCHE）明确指出：“作为运用某种传统和方法书写教育史的研究，教育史学研究已经构成目前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通过对教育史学的历史回顾和梳理，才能弄明白教育史学科需要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及这些方法将引领教育史学科发生怎样的改变。”^③为此，无论怎样强调教育史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分。可见，教育史学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史学科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教育史学追求的是“彰显教育历史科学的自我意识”^④，为教育史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也就是说，通过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派、运用不同分析工具的教育史学者如何“书写教育历史”、“解读教育历史”和“重建教育历史”，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史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教育史的学科性质以及文献的选择和运用等。以工人阶级教育史研究为例，运用不同的教育史学理论和方法会看到不一样的画面。传统教育史学家要么完全看不见工人阶级教育，要么将工人阶级的教育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慈善活动，是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恩惠，是统治阶级教育的附属品。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家将工人阶级教育描述成工人阶级为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史。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家认为在传统教育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那里，看到的都是男性工人阶级，而女性工人阶级被遗忘了，女性在人类教育发展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找到教育史研究

^① W. Brezink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Pedagogics*, By Brice, J. S. London: The Netherlands: Louwer Academic, 1992, p. 150.

^② 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③ C. Campbell, G. Sherington, Margaret White, *Borders and Boundar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Paedagogica Historica, Vol. 43, No. 1, 2007, p. 2.

^④ 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中连接阶级和性别的枢纽。当我们初步弄明白这些问题后，我们又将面临探究在后现代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工人阶级教育史是否真正存在？如存在，它是孤立的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互动呢？等等。因此，通过分析不同教育史学流派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以及分析它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教育历史的全貌。

其次，教育史学推动各国教育史学科改革。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教育史学者呼吁的教育史学科深陷危机的呼声不断高涨。他们指出：“一方面，教育史研究的主要核心正在遭受破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已经变化的外部环境，教育史必须与当代问题联系起来。”^① 21世纪初，国际教育史学者就教育史学科的改革进行了讨论，美国、瑞典、芬兰、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学者纷纷通过教育史学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改革出谋划策。“通过回顾和梳理教育史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教育史作品早已远离了师资培训的需要……弱化了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地位。教育史学科要复兴，必须回归师资培训课程，重新审视传统教育史学。也就是说，在教育史学科变革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成为教育史学家主要的研究对象。”^② 这场关于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讨论，除了涌现一批重新评估传统教育史学的作品外，还推动各国教育史学科改革。一方面，教育史回归师资培训课程，关注教育实践和教师专业性的发展，教育史转向课程史、教师史、学生史和学习史；另一方面，形成各个大学教育史研究的特色，如伦敦大学的教育政策史研究、墨尔本大学的女性教育史研究、剑桥大学的教育口述史研究等。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教育史学研究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学术浪潮，极大地推动各国教育史学科改革。

（二）我国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困境

进入21世纪，教育史学科危机的呼声在中国教育史学界不断高涨。是否存在教育史学科危机，以及教育史学科危机症结何在，成为进入新千年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议题。笔者认为我国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 J. Goodman, I. Grosvenor, “Educational Research – History of Education a Curious Cas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35, No. 5, 2009, p. 605.

^② C. Campbell, G. Sheringt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Survival, Change: Transformations in Education*, Vol. 5, No. 1, 2002, p. 64.

第一，教育史的学科价值受到威胁。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史有什么用”始终困扰着教育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同时，也反映了教育史学科在当今社会日益遭受冷落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史面临从教师专业培养课程中被排挤出的危险，教育史课程的基础地位动摇，致使教育史研究队伍的不稳定等许多不利因素”。^①另一方面，教育史研究重视理论的移植和引入，轻视教育实践，致使教育史学科远离普通教师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远离我国热火朝天的教育改革。

第二，教育史学科未能与相邻学科建立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处于割裂的关系，未能建立教育史学科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正如英国教育史学者加里·麦卡洛克（G. McCulloch）所说：“教育史学科要复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处理好与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对于教育学来说，教育史能够有助于阐释教育问题和教育机会，以及有利于推动教育发展和进步；对于历史学来说，教育史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过去。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教育史能够叙述社会问题的例子。因此，教育史与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三个学科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应通过这三门学科来建立教育史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②而在我国，一直是教育学者在从事教育史研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少关注教育历史。纵览近5年中国教育史学会的年会，几乎全部是教育学者参加，只有两位历史学者参会，社会科学家未参加教育史学年会，教育史学者、历史学者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很少交流沟通，进行合作研究就更少。

因此，如何让教育史研究摆脱这种学术生存状态，如何使教育史研究做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知识贡献，如何建立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每一位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学者普遍关注和思考的议题。而英国教育史学兴起较早，在面对教育自身和教育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时，总能处理好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推动教育史学科摆脱困境。目前，它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史学方法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因此，我们对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其成果可以对我国教育史学科变

^① 田正平、肖朗：《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教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36页。

^② G. McCulloch, *The Struggl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1, p. 4.

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

(三) 英国教育史学的特色

英国教育史学兴起较早，对西方及世界各地的教育史研究产生过较为深远的影响。早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就出现了基督教教会史中对教育历史的记录。进入19世纪后，随着国家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发展，关于学校课程、教育方法、管理方法和学校演化等作品大量涌现，并且这种研究变得相对比较成熟。直至20世纪60年代，传统教育史学范型确立——“在辉格史观的影响下，传统教育史学家将教育史描绘成由国家精英所引领的国家干预教育的逐渐进步的历史”。^① 经历20世纪60年代新旧教育史学的争论和社会学洗礼之后，到70年代，在研究取向上，英国教育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该学派的标志是“整体社会教育史”。一些教育史学家认为教育史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英国传统教育史学的终结，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传统教育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之间的差异性和断裂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在笔者看来，这次范型转换不是完全抛弃性的，而是在继承传统教育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在传承中进行的创新。虽然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是，教育史研究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变。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运用新的方法挖掘教育史研究的新史料，开辟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使他们的教育史学著作带有明显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方法，强调以史料为基础的细节叙述，立足教育史学本位的研究途径，写出了大量可读性和思想性并重的教育史著作，并取得非常大的教育史学成就。

20世纪90年代，一批女性主义者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构建整体教育史的目标，认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家歪曲了一个观点，即他们所提出的底层人民教育历史研究，未包括工人阶级女性的教育经历，以及女性在教育发展和自身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家集中于对教育史学科本身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倡导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教育史学科范式。她们试图克服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的一些缺陷，努力

^① G. Mcculloch, W. Richards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7.

将女性纳入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中。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兴起是继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之后的又一高潮。在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兴起的同时，还有后现代主义教育史学在冲击着传统教育史学，它们汹涌澎湃，四处扩张，攻城略地，标新立异，致使在不长时间内，成为英国教育史学界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后现代主义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根据程度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教育史学的“西欧中心论”的否定，这类作品代表的是世界教育史研究的新潮流，反映了后殖民主义时代教育史学的发展；二是注重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几个流派，诸如新叙述史和新文化史范式下的教育史研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企图颠覆既有的教育史刻板印象。

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思潮的影响下，英国教育史学朝着多样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危机和历史相对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教育史在师资培训课程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教育史学科的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教育史学者开始重新评价传统教育史学，整合新旧教育史学，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传统教育史学复活。传统教育史学的复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史回归师资培训课程。但是，这与传统教育史学时期，作为师资培训课程的教育史学科不同，不是围绕国家干预教育事件对教育政策、伟大思想家和教育改革者和实践者的歌颂，而是围绕“国家课程改革”进行课程史、教师史、学生史和学习史研究，让教师、教育史研究者、学生和教育管理者、教育政策制定者等精英人士一起讨论国家的教育改革；二是教育史学在保持历史学的某些特征时，应密切联系社会科学。教育史学者开始寻求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三是教育史学者反思教育史传统，重新思考教育和民族认同的关系，重构教育史的主流—跨国跨文化视野下民族国家教育史的比较研究。除了复活传统教育史学之外，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英国教育史学者把目光转向了全球视野，推动英国教育史学走向全球教育史学的新阶段，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教育史研究的组织化和机构化，强调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提倡专业研究领域中的重点攻关，关注当代问题，突出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充分阐述当代教育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二是强调教育史中心和边缘的互动，从宏观层面上综合考察人类教育的多样性以及教育运行机制的同一性，以此来说明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教育组织在全球中的互动关系；

三是提倡进行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并促成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最终意味着全球教育史的撰写——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教育史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文明的教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纵览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演变，不难看出存在两条主线：一是教育史和师资培训、教育政策的关系；二是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立，尤其体现在教育史、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新旧教育史学的争论，还是21世纪全球史观下大写教育史的复归，都主要围绕这两条主线进行。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彼得·坎宁汉教授（P. Cunningham）所说：“英国并没有像北美及欧洲大陆部分国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新’与‘旧’教育史学双峰对峙的局面，史学如同历史，其变化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正像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连续性是学术研究的特征……英国教育史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旧’两条路线之间的对立。”^①在“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中，在“传统教育史学”和“新教育史学”的交锋中，新教育史学既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教育史学的基础上重组，也在保守与进步的史观更替和思想冲突的基调下确立，保证了教育史的连续性。英国教育史学者如何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进行改革，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复活和繁荣发展，其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笔者选择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教育史研究面临的困境，能够丰富我国教育史学界对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研究。

二 文献综述

选择“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为研究对象，客观地说是较难的课题。因为，英国教育史学的产生及其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有其不同的流派，因而，所涉及的教育史学文献众多，这些都给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在本研究中，笔者搜集到的有关英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一是论文集，主要有彼得·戈登（P. Gordon）和理查德·赛特（R. Sreter）主编的《教育史：一门学科的形成》（*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罗伊·劳（R. Lowe）主编的四卷本《教育史：重要的主题》（*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加里·麦卡洛克主编的《教育史中的主要读者》

^① P. Cunningham,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The Past Decade of Engl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9, No. 2, 1989, pp. 78–79.

(*The Routledge Falmer Reader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和《教育、历史和社会科学中的文献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 in Educatio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等论文集；二是刊发教育史文章的期刊：英国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美国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国际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Paedagogica Historica)、澳大利亚—新西兰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评论》(History of Education Review)、《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英国教育研究》(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教育管理和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等教育类和社科类期刊；三是教育史学类著作，主要有：麦卡洛克和威廉·理查森 (William Richardson) 的《教育背景中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s)、麦卡洛克的《为教育史而努力》(The Struggle for History of Education)、奥尔德里奇 (Richard Aldrich) 的《从教育史中得到的》(Lesson from History of Education) 等；四是国内关于英国教育史学的著作和论文。下面，笔者围绕国内外英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上述资料进行整理，以期为较深入研究本课题寻找切入点。

(一) 国外研究综述

在英国，教育史研究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是教育史学研究却只有短暂的历史。1868 年，奎克 (R. H. Quick) 撰写了第一本教育史专著。近半个世纪之后，也就是 20 世纪初期，英国教育史学研究才开始慢慢提上日程。

1.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研究：英国传统教育史学阶段

这一时期，主要是传统教育史学的兴起和创立阶段，学者们多是围绕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地位，以及英国教育史研究的民族特性来撰写教育史学作品。1914 年，在《教育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一文中，福斯特·沃森 (F. Waston) “强调教育史与教学技能在教师培训课程中的同等地位，并呼吁所有关注教育的人都应当重视教育史知识的学习”。^① 1917 年，在《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 一文中，贝蒂 (H. M. Beatty) “批判英国教育研究过度重视心理学，忽视教育史研究。

^① F. Wast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ontemporary Review*, in Peter Gordon and Richard Sreter,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London: The Woburn Press, 1989, pp. 19–29.

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教育史研究的工作都远远胜于英国”。^① 贝蒂呼吁英国教育学者应重视教育史在指导教师日常工作方面的重要性。1940年，针对英国教育学界普遍缺乏批判声音的现状，克拉克撰写《教育和社会变迁：一种英国的解释》（*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n English Interpretation*）一书。他明确指出“在不需要彻底摧毁传统教育的情况下，教育学者运用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语言重新解释和评价英国教育的传统，调整传统教育以便适应当今的社会状况”。^② 克拉克批判英国教育研究者未能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来阐释教育。同时，克拉克还提醒英国教育史学者应弄明白社会和历史对教育的影响，通过教育史的学习和研究培养教师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这本小册子，首次让英国教育学者开始关注教育史与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二战”后，面临师资匮乏和教师质量的下降，传统教育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森（J. W. Adamson）开始反思英国教育史学陷入低谷的起因，并探索走出低谷的出路。1946年，在《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呼唤》（*A Plea for History Study of English Education*）一文中，亚当森发现“英国教育史学的作品多是译介国外的作品，或者是对国外教育历史的研究，对英国本民族的教育史研究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③ 在此文中，亚当森敏锐地把教育史研究与国家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突出研究英国教育史的重要性，强调英国教育史学的民族特性，将英国教育史学的中心从“西方教育史”转移到“英国教育史”。

2.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的研究：英国新教育史学的兴起阶段

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的帮助下，一批教育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置身于变革的时代，热心新教育史学的建设，肩负起更新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重任。1955年，琼·西蒙（J. Simon）开始尝试重新阐释英国教育经验。在《英国教育研究》（*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中连续撰写两篇文章《利奇关于宗教改革（I）》（*A. F. Leach on the Reformation*）。

^① H. M. Beatty,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History", in Peter Gordon and Richard Sreter,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London: The Woburn Press, 1989, pp. 30–38.

^② F. Clarke,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n English Interpretation*, London: The Sheldon Pr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0, p. 11.

^③ J. W. Adamson, "A Plea for History Study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Peter Gordon and Richard Sreter,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London: The Woburn Press, pp. 39–46.

mation: I) 和《利奇关于宗教改革 (II)》(A. F. Leach on the Reformation: II)，用犀利的语言攻击利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错误性，认为教育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应该运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教育史。因此，琼·西蒙被誉为英国教育史学界“第一位反传统习俗的教育史学家”^①。

1960 年，布莱恩·西蒙 (B. Simon) 的《教育史研究，1780—1870》(*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1780 – 1870*)，后来改名为《两个民族和教育结构，1780—1870》(*The Two Nations and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1780 – 1870*) 一书出版，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教育史学，推动着英国教育史学的变革。布莱恩指出“传统教育史学主要论述了学校和学院组织以及教育改革者的思想，因此往往呈现给教育学者，而不是呈现给普通读者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教育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社会各阶级的观点。我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经常被忽略的方面，尽力叙述教育改革者的思想，以引起当代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变化。”^② 1966 年，在《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一文中，西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鼓励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育系的学生进行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研究对象应从精英主义的教育机构、伟大教育思想家、改革家和教育政策转移到多数人参加的教育运动，关注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背景的关系。同时，他还指出‘教育运动不只是和谐进步的，还存在着冲突和争议的一面’^③。由此可见，西蒙试图改变传统英国教育史学孤立而封闭的研究状态，打破了教育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壁垒，给历史学家理解和认识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末，英国专业历史学界也有学者彻底反思英国传统教

^① B. Sim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1980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1, 1982, p. 87.

^② B. Simon, *The Two Nations and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1780 – 187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4, p. 13.

^③ B. Simon,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Kegan Paul (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73, p. 126.

育史学。在《历史》(History)^① 和《历史期刊》(Historical Journal)^② 两份历史学的期刊上都刊登了批判传统教育史学的文章，鼓励历史学家进行教育史研究。专业历史学者认为教育学者应该重新确立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这三门学科对教育史研究的指导，并就教育史研究提出具体的改革策略。

3.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研究：英国新教育史学流派纷呈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英国新教育史学呈现流派纷呈，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的教育史学研究主要是批判的声音，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重构英国教育史学。

1972年，在《教育史研究》(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一文中，布瑞格斯(A. Briggs)认为历史学已经完成了新史学的变革，而教育史还没有进行相应的变化，因此，教育史学者应该开始新教育史学的改革，建立教育史和历史学的关系，教育史研究应成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③ 1972年，在《教育史的过去和现在》(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Past and Present)一文中，琼·西蒙通过对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回顾，指出教育史和社会史的联合是英国教育史学的未来趋势。1972年，在《忽略的东西：维多利亚时期大众教育的奇特案例》(Aspects of Neglect: the Strange Case of Victorian Popular Education)一文中，西尔弗(H. Sliver)也接受布瑞格斯对教育史学者的建议，运用新史学的观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教育史作品进行了分析。在《只有过去，还是只有现在？》(Nothing But the Present, Or Nothing But the Past?)一文中，西尔弗认为随着思想的解放而变化的观念的研究是教育史研究的核心，也就是，社会教育史事实上是教育观念史。在这里，西尔弗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教育思想史研究，而是关注人群、人的行为背后的舆论、思想、文化的因素。因此，观念对于教育发展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教育史学》

^① G. Sutherl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Peter Gordon and Richard Sreter,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London: The Woburn Press, pp. 73–84.

^② R. Sereter,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Peter Gordon, Richard Sreter (ed),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London: The Woburn Press, pp. 85–104.

^③ A. Brigg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Roy Lowe,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I: Debat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Routledge Falmer, 2000, pp. 153–167.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 一文中，西尔弗通过梳理英美两国的教育史学发展历程，认为教育思想史、教育政策史和教育机构史在过去是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在当今变化的社会中，以不同的变体仍旧存在着。

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1980s'*)一文中，西蒙通过对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回顾和梳理，认为英国教育史学经历了低谷和繁荣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教育史研究，推动了英国教育史学的发展。^① 1982年，在《说教的历史：教育史的奇特用途》(*History as Propaganda: the Strange Use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一文中，罗伊·劳(R. Lowe)将矛头指向英国教育史学的辉格特色，将英国传统教育史学者主要分为三类：教育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师资培训工作的教师和参与教育改革的历史学者。同时，劳还指出三类研究人员的缺失：他们将过去教育描述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进步和国家干预教育的赞歌，是一种说教者，带有浓厚的辉格特色。劳认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教育史学都可以归于这三类教育史研究，统称为辉格教育史学派”^②。

80年代末，英国教育史学者开始逐渐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史学者进行交流。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教育史学会会刊《教育史评论》上刊发琼·西蒙的《教育史与“新”社会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the “New” Social History*)一文。在澳大利亚的《教育研究和观点》(*Education Research and Perspectives*)期刊上刊发斯提芬斯(W. B. Stephens)的《英格兰教育史学新趋势》(*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一文。在美国教育史学会刊《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上刊发坎宁汉的《教育历史与教育变迁：过去十年的英国历史学》(*Education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The Past Decade of English Historiography*)一文。在《加拿大教育史学会公告》(*Canadian History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 Bulletin*)期刊上刊发奥尔德里奇的《教育史的核心问题：英国的观点》(*Central Issue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① B. Sim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1980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Vol. 30, No. 1, Feb. 1982, pp. 175–176.

^② R. Lowe, “History as Propaganda: the Strange Use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Roy Lowe,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I : Debat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Routledge Falmer, 2000, pp. 238–254.

tion: An English Perspective) 一文。上述这几篇文章，均是向国外教育史学者介绍英国教育史学的新面貌，同时，也展示了英国教育史学者革新教育史研究方法的信心和勇气。

伴随着西方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来自于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英国教育史学。1992年，在《英国教育史学：一种女性主义批判》(The Historiography of British Education: A Feminist Critique) 一文中，博维斯 (J. Purvis) 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英国教育史学界面对女性主义的挑战表现出来的行动迟缓。博维斯以有关19世纪英国教育史的历史作品为例指出，“英国教育史学界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学术世界，其研究重点是男人或男孩的教育，女人和女孩的经验往往被弱化。她极力呼吁教育史学家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①。1996年，在《后现代性与教育史学家》(Postmodernity and Historians of Education) 一文中，罗伊·劳指出“英国教育史学过多关注教育制度或教育结构，忽视教育中人的思想和心态，忽视更深层次的文化剖析”。劳提醒英国教育史学者，“教育史研究应做出一些调整来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②。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思潮的影响下，英国教育史学朝着多样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历史相对主义盛行和“碎片化”危机。在多元和微观研究中，如何重构教育史研究的主流，是摆在英国教育史学者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4. 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1年：英国教育史学新旧整合阶段

1999年，威廉·理查森以英国教育史学的主要研究群体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为主线，梳理了“二战”后至1996年的英国教育史学的发展状况。^③ 2007年，在《世纪之交，国际背景下的英国教育史学，1996—2006》(British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1996—2006) 一文中，威廉·理查森从全球化视野分析了

^① J. Purvis, “The Historiography of British Education: A Feminist Critique”, in A. Rattansi and D. Reeder, *Rethinking Radical Educ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Brian Sim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2, pp. 249–266.

^② R. Lowe, “Postmodernity and Historians of Education”, in Roy Lowe,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I: Debat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Routledge Falmer, 2000, pp. 281–295.

^③ W. Richardson, “Historians and Educationist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in Post-war England”,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28, No. 1, 1999, pp. 1–30 and Vol. 28, No. 2, 1999, pp. 109–141.